

# 上古汉语非宾格动词研究

杨作玲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古汉语非宾格动词研究/杨作玲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7-100-10514-9

I. ①上… II. ①杨… III. ①古汉语—动词—研究—上古 IV. ①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444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书出版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编号 10YJC740123)  
和三峡大学学科建设项目基金的支持。

上古汉语非宾格动词研究

杨作玲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514-9

---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 1/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 序

按照传统语法的思路,动词分及物和不及物两类,及物与不及物的区分标准是是否能带宾语,能带宾语的就是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的就是不及物动词。1978年皮尔马特(D. M. Perlmutter)将不及物动词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发现不及物动词的唯一论元在深层结构中的语义角色实际上有两种,一种在深层结构中受事,另一种在深层结构中施事,因而有了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与非作格动词(nergative verb)之分。1994年狄克森(Dixon R. M. W.)出版《作格》,次年列文和拉帕波特(Levin B. & M. Rappaport Hovav)出版《非宾格——句法与词汇的语义接口》,两部著作尽管研究的角度和范围不同,但所关注的主要对象都是非宾格动词。

杨作玲博士将非宾格动词理论运用到上古汉语的动词研究之中,比较系统地考察了上古汉语非宾格动词的各个次类,揭示出上古汉语非宾格动词次类之间的句法差异以及某些次类内部不同动词之间的句法差异,进而发现上古汉语非宾格动词的非宾格性不是整齐划一的,非宾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之间也不是界线分明的。与以往的相关研究相比,杨作玲博士的研究工作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她注意到非宾格动词的“清浊别义”现象,注意到“去声别义”与非宾格动词之间的关联,在研究过程中明确地将“清浊别义”与非宾格动词的句法功能结合起来,将清浊两读的句法功能分别开来加以考察,也注意到“去声别义”现象对非宾格动词句法功能

的制约,这在上古汉语句法研究中首次有了系统的形态学眼光。

杨作玲博士并不满足对上古汉语非宾格动词句法运作规律的探讨和揭示,在深入探析上古汉语非宾格动词句法运作规律的基础上,她进一步思考上古汉语的类型特点。语言类型学研究已揭示出宾格型语言和作格型语言在句法运作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宾格型语言注重区分主动和被动,而作格型语言则注重区分自动和使动,20世纪90年代徐通锵先生就曾指出,汉语和印欧语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印欧语凸显的是主动和被动,而汉语凸显的是自动和使动。杨作玲通过自己的考察并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上古汉语是一种语义作格型语言,这一结论对于进一步研究上古汉语的形态句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杨作玲博士的研究不仅揭示了上古汉语非宾格动词的句法运作规律,也展示了很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原生性状态动词的使动化采取形态手段而非原生性状态动词的使动化则采取施用化的使动句法基模?为什么上古汉语的及物性拓展几乎没有边界?希望杨作玲博士继续努力,逐一揭开上古汉语形态句法的诸多未解之谜。

杨作玲博士2003年重新负笈南开,其时她已为人妻为人母。之后六年,抛家别女,焚膏继晷,孜孜以求。这部书稿是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作为她的老师,我不仅乐见其成,更感佩她的精神。在物欲横流的世风之下,她的这种精神尤其难能可贵。

是为序。

洪 波

甲午正月于京城四毋斋

#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上古汉语动词研究述评	1
第二节 非宾格动词理论及主要成果	8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主要目标	13
第四节 本书相关术语的界定及结构安排	16

## 上 编

第二章 状态动词	18
第一节 “败”类动词	18
第二节 “见”类动词	44
第三节 “治”类动词	68
第四节 “伤”类动词	87
第三章 存现动词	109
第一节 起	111
第二节 作	115
第三节 兴	120
第四节 立	123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31
第四章 趋向动词	134

## 2 上古汉语非宾格动词研究

第一节	指示方向类:来、去	136
第二节	里向类:入(内/纳)	146
第三节	外向类:出	155
第四节	下向类	162
第五节	后向类	166
第六节	前向类	172
第七节	上升类	176
第八节	经过类和环绕类	178
第九节	不定向类	182
第十节	本章小结	186
第五章	心理动词	190
第一节	怒	190
第二节	惧	194
第三节	畏	199
第四节	服	203
第五节	悦	207
第六节	喜	212
第七节	本章小结	216
第六章	形容词的非宾格性探讨	219
第一节	顺	219
第二节	纾/缓	226
第三节	乱	232
第四节	深	236
第五节	大/小	239
第六节	本章小结	242

## 下 编

第七章 非宾格动词可能的判断式及其意义·····	244
第一节 典型非作格动词的句法特征·····	244
第二节 典型及物动词的句法特征·····	256
第三节 非宾格动词的判断式及其合理性探讨·····	270
第四节 各语义类别动词非宾格性的强弱·····	305
第五节 本章小结·····	322
第八章 非宾格动词的派生方向及相关问题·····	325
第一节 非宾格动词的派生方向·····	325
第二节 两种不同的清浊交替形式·····	336
第九章 上古汉语语言类型的指向·····	350
第一节 上古汉语的及物性扩展·····	351
第二节 名词成分的非强制性·····	362
第三节 使动态·····	366
第四节 语序及旁格宾语的实现·····	377
第五节 上古汉语的语言类型指向·····	382
第十章 结语·····	391
参考文献·····	396
后记·····	412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上古汉语动词研究述评

上古汉语动词研究成果按照著述类型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作为参考语法的动词研究,以《马氏文通》(1898)为开创者,后如《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杨伯峻、何乐士 2001),命名为《古汉语语法》《古汉语语法学》之类的著作或教材均属于此类;二是专书动词研究,如《〈吕氏春秋〉词类研究》(殷国光 1997)、《〈论语〉的动词、名词研究》(边滢雨 1997)、《〈左传〉谓语动词研究》(张猛 1998, 2003)、《〈孙子兵法〉谓词句法语义研究》(易福成 1999)、《〈战国策〉动词研究》(金树祥 2000);三是单篇专题研究,如 Cikoski (1978a, b)、大西克也(2004)和宋亚云(2005)。从研究取向上,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在传统“及物性”观念影响下的传统动词分类研究,以《马氏文通》(1898)和李佐丰(1983)为代表;二是引入作格动词概念的研究,主要有 Cikoski(1978a, b)、易福成(1999)、大西克也(2004)、宋亚云(2005)和巫雪如(2009)。

### 1 传统动词分类研究述评

在上古汉语动词研究体系上,从《马氏文通》(1898)以来,一直沿用及物和不及物的概念来划分动词,这种两分法或者叫外动词和内动词,或者称为他动词和自动词。

马氏区分这两类动词(外动/内动)的标准是能否带止词(受事宾语):不及物动词不带止词,但可以带转词(表示处所、对象、原因等的宾语);及物动词可以带止词。马氏这种分类并不能很好地贯彻始终,主要问题有二:

一是作为划分外动词和内动词形式基础的转词和止词纠缠不清,这直接影响了对外动词和内动词的判断。这在《〈马氏文通〉读本》(下称《读本》)“导言”中已经指明:《文通》“正名”中没有为转词专立一条界说,在对转词的几次论述中对象不一,“外动行之及於外者,不止一端。止词之外,更有因以转及别端者,为其所转及者曰‘转词’”“内动者之行不及乎外,故无止词以受其所施……而施者因内动之行,或变其处焉,或著其效焉,更不能无词以明之,是即所谓‘转词’也”;句法特征不一,从形式方面,可以是有“介字以先焉”,“或无介字以先之,或虽无介字却可以加介字”;语义不一,可以“指人,指处,指时,指价值、度量、原因、目的、效果、方面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不能将转词与止词很好地划分开来(详见《读本》第17—18页)。

二是在如何对待有使动用法的动词上,马氏不能自圆其说。同一动词忽而内动忽而外动。《文通》对有使动用法的动词的处理归为“内动字用若外动字”:“内动字无止词,有转词,固已。然有内动字用若外动者,则亦有止词矣。”作者列举了“来、泣、立、坐、前、仕、怒、信、逃、入、惊、饮、死、去、走、相、殉、害”等他所认为的内动字用作外动的一些例子,然后说:“若是,动字之用有两歧者,亦时见于书”。

李佐丰《先秦汉语的不及物动词和及物动词》(1994)一文及其他有关上古汉语语法的论文对于上古汉语语法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此文对先秦汉语动词的分类仍然是在“及物动词”和“不

及物动词”的大框架下进行。其中“自动词”下分为真自动词和准自动词,他动词下分为“真他动词”和“准他动词”。

此文举出的真自动词例极少,共 18 个动词:对、卒、薨、崩、疾(生病)、病(病重)、譟、饑、旱、灾、枯、宴、次(驻扎)、宿、狩、往、叹、吠。

而举出的准自动词却远远超过真自动词,达 37 个:怒、恐、憚、喜、说(悦)、耻、死、来、至、出、入、反、归、走、逃、田、坐、起、涉、济、飞、畔(叛)、降、朝、盟、会、遇、亡、成、败、立、定、惊、尽、竭、兴。

此文也承认真自动词数量不多,准自动词的数量比真自动词多。在“自动词”和“他动词”的二分对立中划分自动词的次范畴,真自动词应该是自动词的原型代表,作为原型的真自动词数量至少不低于准自动词。因此从句法上是否带宾语来给动词归类在上古汉语中往往使动词次范畴的划分困难重重。其实一直让动词次范畴问题变得复杂的正是能够带使动宾语的动词,它们往往既能带使动宾语,又能带用介词“于/於”引介的旁格成分,有时旁格宾语也可以不需要介词引进。因此纯粹从句法及物来观察的“及物”和“不及物”现象不能很好地来给上古汉语的动词归类,在“活用”与“本用”之间孰为“本”孰为“活”也很难区分。

## 2 上古汉语作格动词研究述评

从非宾格动词角度进行上古汉语的动词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已经开始,即有关的作格动词研究,主要是 Cikoski(1978a, b)、易福成(1999)、大西克也(2004)、宋亚云(2005)和巫雪如(2009)的研究。

这五位学者对作格动词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类,Cikoski、大西克也是一类,他们是将作格动词纳入动词的次类范畴中,而不

是不及物动词的次范畴。

Cikoski 认为几乎所有的古汉语动词都可以分为“中性动词”和“作格动词”。这两类词是根据其词汇特征而加以区别的,正是这些特征允许作格动词参与某些转换,而中性动词则受到限制,或者正好相反,如“辟”是中性动词,“免”是作格动词。

大西克也受 Cikoski 的启发,对另一类作格动词(即有“施受同辞”或“反宾为主”用法的动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选择了 40 个经常出现在“X+V+Y”(及物句型)中的动词,然后检查它们用在不带宾语的“NP<sub>1</sub>+V”句型时,其主语(NP<sub>1</sub>)是施事(X)还是受事(Y)有没有一定的倾向。根据调查的结果,作者将这四十个动词分为两类,并采用 Cikoski 的术语,仍然称为“中性动词”和“作格动词”。

大西克也认为中性动词不带宾语时一般用于施事主语句,用于受事主语句是例外;作格动词不带宾语时一般用于受事主语句,用于施事主语句则是例外,例外的条件大多数均可以找到,这些条件就构成了先秦汉语主语施受关系中立化的种种原因。大西克也研究的作格谓词,主要相当于传统所说的有“反宾为主”用法的及物动词(或称行为动词),这与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作格动词概念有别。

易福成(1999)和宋亚云(2005)可归为第二类做法,他们的研究关注作格动词的使动用法情况。

易福成(1999)全面描写了《孙子兵法》中 53 个作格谓词的各种句法分布,将上古汉语作格谓词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所列举的作格谓词大致相当于一部分有使动用法的状态动词和形容词,如:安、败、立<sub>1</sub>、立<sub>2</sub>、备、变、成、出、存、大,等等。

宋亚云(2005)设立了“作格动词”类,从而将先秦汉语的动词

三分为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和作格动词。他根据句法特点来归纳“作格动词”：带宾语时，主语一般是施事（或者是属于主体格的致使者、感事等，也可以不出现），宾语一般是受事（或者是属于客体格的当事、结果等）；不带宾语时，主语一般是受事（或者是属于客体格的当事、结果等）。这个特点可以概括为“可逆转性”，即：“作格动词”所带的客体格宾语一般能够比较自由地转成主语而不会引起歧义。其研究重点并非在于从非宾格动词理论的视角来探讨先秦汉语非常复杂的语义、句法现象，而更多的是要确定先秦汉语作格动词这一类别，描写汉语作格动词从先秦到中古的历史演变，勾勒各类作格动词的大体演变趋势和规律，即及物性的增强或减弱。

巫雪如(2009)归为第三类，该文认为早期汉字中某些动词的会意式构图方式体现了动词的语义结构，援引认知语义学分析先秦汉语中的作格动词，对过去有争议的部分作格动词进行古文字结构分析，最后提出作格动词就是一个包含行为和结果状态双重内涵的动词，在使用时由于突显的焦点之间的差异，动作语义者进入施事句，结果状态语义者进入受事句。其作格动词范围与大西克也相同，“包含使动词和部分及物行为动词”。

需要指出的是，刘承慧(1994)将先秦动词分为四类：高及物动词、低及物动词、使动词和作格动词。其可贵之处在于看见了先秦动词语义及物和句法及物不相适配，从句法角度，先秦动词算得上均为及物动词。但对作格动词的限定和其语义句法特征不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所以刘承慧(2006b)又从“及物性”角度将先秦普通动词分为高及物动词和低及物动词，属于高及物动词的成员是及物行为动词，属于低及物动词的成员有：不及物行为动词、感知动词、结果状态动词、状态动词。作格动词不再纳入她的分类

范畴。

可见,迄今在上古汉语中引入的作格动词研究所指不明,作格动词的外延和内涵均界定不清,与真正的非宾格动词(作格动词)研究取向存在着明显差异,还存在研究的空间和价值。

### 3 过去的动词研究不重视语音分别

无论是传统的动词研究,还是引入作格概念的动词研究,语音问题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动词异读现象未和动词的研究有机结合,从而相关成果尚不能很好地揭示上古汉语的句法-形态面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马氏文通》(1898)虽然注意到先秦汉语动词存在异读现象,但并没有在动词的构句功能中关注这一类动词,从而也无法准确理解它们在先秦汉语句法系统中的地位。而后续的动词研究中这一问题依然存在。如存在清浊异读的“败”,李佐丰(1983)没有辨析清、浊声母各自出现的句法环境,一以律之,归为准自动词。蒋绍愚(2000)提出了可根据四条语法功能来判断一个动词是内动还是外动,根据“败”的语法功能将之归为外动词。蒋先生也注意到了动词存在“清浊别义”和“四声别义”现象,但他认为“‘败’在甲骨文中是内动。本文说它是外动,那是因为它们由于经常用作使动而发展为外动,在先秦典籍和《史记》中已具有了外动词的语法功能”。但此文的着力点不是探讨这种语音分别造成的两用动词与上古句法-形态的关联。

易福成(1999)和宋亚云(2005)对作格动词的研究都忽略了动词语音的分别对动词构句的影响。如宋亚云(2005)在探讨作格动词从上古到中古的演变时,认为“破”类为“强及物性作格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动词”。在他选取的10个典型动词中,“败”“断”

“绝”“折”“毁”“坏”等六个动词在《经典释文》中都是两读的,该文没有对这些动词进行语音的区分和甄别。

巫雪如(2009)提及“音变别义”,但她认为对音变别义的动词加以区别的主要是句法,而且主要依据的是语境,如果能够根据语境清楚地辨认,动词有无“音变别义”并不重要。

需要说明的是,黄坤尧(1992)对《经典释文》中的两读动词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归纳了部分两读动词各自进入的句式。但他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切切实实地考察陆德明究竟凭什么标准区别动词的两读?唐代的语法观念会是怎样?”(黄坤尧 1992:75)其出发点和探究目的与本文大相径庭。

在对古汉语的构词研究中,异读动词早已进入学者们的视野,特别是周法高(1962)、金理新(2006)都通过异读动词出现的不同句法环境来探讨其中隐藏的词汇派生或形态现象。但此类研究存在的弊端是未对相关句法现象进行完整的探讨,征引例子不足,从而某些说法失之于主观,系统性不够。

动词在句法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要弄清上古汉语的句法结构规律,必须对上古汉语的动词进行深入的考察;动词异读反映的现象往往与形态相关,上古汉语形态问题到现在的研究着重于语音学领域,尚无人完整地从句法角度来探讨相关现象,而对不同读音的动词出现的句法环境进行全面考查显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上古汉语的形态问题。上古汉语动词的研究始终面临两个问题的困扰:一是什么样的动词可以使动化;二是如何看待非论元的宾语身份<sup>①</sup>。这两大问题实际上均涉及如何理解上古汉语的论元指派问题。或者正是因为动词异读现象在研究中的缺失导致至今我们对相关问

① 非论元是指从语义上来看,该名词成分不是动词的必有论元,而是外围成分。

题的认识仍处于懵懂状态,因此上古汉语的动词研究必须有新的切入点,必须结合动词异读现象来探讨。本书用非宾格动词理论研究上古汉语动词实际上是利用词汇功能语法的相关研究成果,关注上古汉语的异读动词,试图从语义和句法的接口处重点研究上古汉语与非宾格动词相关的形态-句法现象。

## 第二节 非宾格动词理论及主要成果

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是从句法特征方面对单论元不及物动词的观照,即这类动词句法上的主语实际上是深层语义中的受事。有人称其为作格动词(ergative verb)、起动动词、夺格动词等,国内学界常用作格动词之名。细究起来,“非宾格动词”和“作格动词”这两个术语是“混言则同,析言则异”。

明确把非宾格动词和作格动词分开的是影山太郎(2001)的《动词语义学》。作者把“open/开”“break/破碎”等可以不改变形式直接转变为及物动词的不及物动词称为“作格动词”,把“occur/发生、存在”“happen/发生”“appear/出现”等没有对应的及物动词的不及物动词称为“非宾格动词”。

虽然某些学者使用“作格动词”与本书采用的“非宾格动词”指的是同一语言现象,但对非宾格动词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动词的句法特征,即该类动词不能指派宾格,加之迄今有关上古汉语作格动词的研究中,“作格动词”的所指不一,研究角度各异,主要是从句法上的形式变换着手,着重于动词的分类,这样的研究取向与非宾格动词理论并不完全切合,因此本书从非宾格动词之名。

## 1 非宾格动词理论的主要思想

1978年,Perlmutter提出著名的非宾格假说时,是在关系语法(Relational Grammar)的框架下将传统意义上的不及物动词进一步区分为非宾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unergative verb)两个次类;从语义和句法关系来看,它们都属于一元动词,而且其唯一的论元通常都充当句子表层结构的主语,但两类动词与其论元之间的深层逻辑语义关系却有着本质的差别:非宾格动词表层结构中的主语是深层结构中的逻辑宾语,而非作格动词表层结构中的主语也就是深层结构中的主语。这就是所谓的“非宾格动词假说”(Unaccusative Hypothesis)。

Burzio(1986)继承了Perlmutter的思想并在生成语法的框架下加以发展。从生成语法管约理论的角度来看,非作格动词在句中只带一个受论旨<sup>①</sup>标记(theta-marked)的深层逻辑主语,属于深层无宾语结构,而非宾格动词在句中则只带一个受论旨标记的深层逻辑宾语,属于深层无主语句。按照Williams(1981)的划分标准,非作格动词的唯一论元是动词的外在论元(external argument),而非宾格动词缺少外在论元,其唯一的论元是内在论元(internal argument)。

## 2 非宾格动词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

自“非宾格假说”(Unaccusative Hypothesis)提出以来,语言学家对不同语言的非宾格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既显示了非宾

---

<sup>①</sup> 论旨为管辖与约束理论术语,指施事、受事、处所、源点、目标这类语义角色;也称作题元角色。其他理论中常称作语义格。

格假说的理论价值,也体现了非宾格现象的复杂性。

## 2.1 对非宾格动词判断式的探讨

因为深层语义结构上的差异,非宾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在表层句法结构中表现出了一系列的不同之处。人们因而将这些句法特征视为区分非宾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的判断句式<sup>①</sup>。其中,文献(如 Perlmutter 1978; Burzio 1986; Donna Jo Napoli 1988; L&RH 1995 等)中提到较多的有如下一些:

(1) 使役结构和不及物结构的转换。非宾格动词的唯一论元为深层宾语,因而可以出现在使役结构的宾语位置上。非作格动词不能用这种转换。

(2) 助动词的选择(auxiliary selection)。在法语、德语等语言中,非宾格动词选择与英语 BE(是)相当的助动词,而非作格动词选择与英语 HAVE(有)相当的助动词。

(3) 结果式结构(resultative construction)。在英语中,表结果的词语语义上指向及物动词的宾语,而不指向主语。非宾格动词的主语由于实际上是动词的深层宾语,因而可以带结果补语;相反,非作格动词不能直接带结果补语。

(4) 非人称被动句(impersonal passive)。在一些语言(如丹麦语)中,非宾格动词不允许被动化;相反,非作格动词允许有非人称被动式。

(5) 过去分词做名词修饰语(prenominal perfect participles)。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可以充当直接宾语相应名词组的定语修

---

<sup>①</sup> diagnostics 在非宾格动词研究中国内多用“诊断句式”或“诊断式”称之。本书接受吴福祥先生的建议,称为判断句式、判断式。